

□惟寅

秦人的地理观

空间和时间,是左右人类生存的两大要素。空间观直接体现在地理观念中,时间观直接体现在历史观念中。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,构成了宇宙观的根本。

战国时代,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日渐丰富,地理观念也有了长足的发展。《禹贡》一书将中国划分为九州,即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荊州、豫州、凉州和雍州,可称之为小九州地理观。这种地理观的范围,大致局限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。《山海经》一书的出现,则大大扩充了地理想象范围,明确提出了海内和海外的地理观,认为大陆在海内,而海外还有更大空间。

邹衍是战国末年人,他提出了大九州学说。在他看来,天下共有八十一大州,中国只是其中之一,叫作赤县神州。八十一州内各有九小州,《禹贡》所说的九州,是赤县神州内的九小州。八十一个大州的每州之外,都有小海环绕,人兽不能相互往来。整个八十一大州之外,有大瀛海环绕,天地的边际就在那里。

邹衍的大九州之说,是基于《禹贡》九州说的扩张性推想,也受到《山海经》海内海外观念的影响,虽然被批评为“闳大不经”,却拓宽了中国人的地理观念。他的学说在战国时期的各国大为传播,成为当时地理观念的主流。

秦统一天下,消灭了诸侯各国,天下只剩秦国。在秦人的眼里,不但远古以来王朝交替、列国并立的历史已经终结,目力所及、日月所照的地理世界,也都成了秦国的领土。也就是说,新建的秦王朝成了天地之间唯一的国家,独国世界的地理观由此形成。

公元前219年到前210年的九年时间中,秦始皇巡狩东方各郡,在七处山顶“刻石颂秦德”。秦人的地理观,在刻石文中有清楚的表现。琅琊刻石写道:“皇帝之德,存定四级……六合之内,皇帝之土。西涉流沙,南尽北户。东有东海,北过大夏。人迹所至,无不臣者。”

四极,就是东南西北四方的尽头;六合,四方加上下,就是天地之间、四方之内,概括了当时的空间世界。四方之内,是秦人地理眼界的极限,在琅琊刻石中有具体所指。西方的尽头在西北的沙漠,南方的尽头在南越,东方的尽头在东南的海上,北方的尽头在长城以内。秦王朝这种地理边界的认识,大致与秦统一后直接统治的地域,也就是单一郡县制的地域相对应,即《史记》所说的,“地东至海暨朝鲜,西至临洮、羌中,南至北向户,北据河为塞,并阴山至辽东”。

李开元据此认为,秦统一天下后,并没有接受邹衍的大九州说,也没有受到《山海经》的影响,而是回到了《禹贡》的小九州说,将天下四方理解为中原及其周边地区。

更直接的证据是,在芝罘刻石文中,直接将“四极”“天下”与“宇县”并举,表示地理的边际。按照《史记集解》的解释,“宇县”的字,就是四方,县,当为赤县。宇县,就是神州赤县。



祭日塘秦刻石

走进秦王朝的宇宙观

从6月8日起,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一处刻石,在学界掀起一场近年来少有的公开学术争鸣。9月15日,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,公开了经过两次实地考察研究的数据和最终结论,认定此处刻石为秦代刻石,定名为“祭日塘秦刻石”。

秦代刻石的发现,因涉及“昆仑”,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。近年来,历史学者李开元推出《秦崩》《楚亡》《秦谜》等著作,就秦汉史问题提出许多独到见解。最近,他的新作《刺秦:重新认识秦王朝》出版,书中关于秦王朝宇宙观的思考,为理解“祭日塘秦刻石”的深层次文化内涵,提供了一些借鉴。

汉朝多层次的治理体系

《禹贡》的小九州说,是一个有限的地理世界,以天子所在的王城为中心,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文化地理秩序,称为“五服”。王城周围地区,称甸服,在天子的直接统治之下;甸服之外的地区,是侯服,为王所分封的诸侯国所在;侯服之外的地区,是绥服,属于被征服的地区;绥服之外,是要服,属于接受管制的地区;要服之外的地区,是荒服,属于不受管制的地区,是文明世界的边际。分属于五服的不同国家和人民,按照不同的方式,向天子缴纳不同的贡赋,尽不同的义务。可见,《禹贡》的小九州说,是与封建制配套并行的地理和政治文化观念。

然而,在秦王朝的诏令和刻石文中,对《禹贡》所表达的五服秩序观念,采取了一种完全否认的立场。秦统一天下的当年,大臣在对重新议定秦王称号的回答中说:“昔者五帝地方千里,其外侯服夷服,诸侯或朝或否,天子不能制。今陛下兴义兵,诛残贼,平定天下,海内为郡县,法令由一统,自上古以来未尝有,五帝所不及。”

李开元将秦王朝的地理观,概括为“独国世界地理观”。这一

观念认为,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,就是秦王朝,秦王朝已经统治了全世界,秦始皇是全世界的唯一统治者。

《刺秦》直言,今天看来,这种地理观是一种盲目自大的观念。它不但从邹衍的大九州、《山海经》的海内外倒退到《禹贡》的小九州,也将《禹贡》小九州说中的远近分层秩序抛弃,完全对应了秦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单一郡县制狭小世界。

与汉王朝对比,感受会更直观。汉王朝北方有匈奴,南方有南越,东北有朝鲜,东南有闽越,西南有西南夷。为了应对周边四方,汉朝逐渐树立起一种多元的世界观,创建出一套多层次的治理体系,史家称之为“册封体制”。册封体制后来发展成近代以前通行于亚洲东部的一种国际秩序。中原的王朝国家,通过称号、印玺、任命书的授予,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一种宗主国和从属国的君臣关系,以此确立所在区域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。在“册封体制”的运作之下,以汉朝为中心,在亚洲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政治文化势力圈,即“东亚世界”和“中国文化圈”。

秦统一天下后,对百越地区先实行军事征服,然后建立郡县,

实行直接统治;对匈奴也是实行军事征服,派遣三十万大军出击,占领了河套地区,实行郡县统治。但是,对于无法实行郡县统治的蒙古高原,因为无力应对,只有修建长城,将其与能够实行郡县统治的地区隔离,以不承认、不往来的自闭方式,完成单一郡县制下天下一统的自我满足。李开元认为,依循这种地理观,秦王朝不但完全丧失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空间,也终止了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,从而走向了速亡。

由此,也可以重新思考郡县制的利弊。秦王朝实行单一郡县制,从一方面看,中央政府和皇帝的权力确实强化了,帝国内诸侯相争的隐患消除了;但是,从另一方面看,秦王朝对于不能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区,也失去了应对能力,无法同汉朝一样,在更加广大的区域建立起多层次的治理体系,对更加广阔的地域建立起开放的势力范围。

历史的“终结者”

邹衍的学说,除了大九州的地理观,还有五德终始的历史观。邹衍把历史看做王朝循环的过程,每个王朝都与金木水火土所规定的一种“德”相匹配,不仅要

遵循这种“德”的种种相应规定,也将接受这种“德”所带来的命运。这种命运被称为“德运”,依循木克土、金克木、火克金、水克火、土克水,也就是五行相克的原理,周而复始地循环。

邹衍将这种理论套用到历史中,认为黄帝的时代与“土德”相匹配,对应的颜色是黄色;夏禹的时代与“木德”相匹配,对应的颜色是青色;商汤的时代与“金德”相匹配,对应的颜色是白色;周文王的时代与“火德”相匹配,对应的颜色是红色。他们都遵循五行相克的原理,经历兴盛衰败后,取代上一个败者,又被下一个胜者所取代。

邹衍活动在关东六国,没有到过秦国。不过,邹衍的学说是流传到了秦国的。吕不韦出任秦国相国,主持编撰《吕氏春秋》,其中就有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内容。不过,秦王朝的历史观与此有巨大差异。

秦王朝的历史观如同秦王朝的地理观一样,可见于秦王朝的诏令和刻石文中。秦统一天下的当年,秦国君臣曾经就皇帝称号的采用,展开慎重的议论。据《史记》的“议皇帝号诏”,秦始皇首先回顾了消灭六国的过程,然后说:“寡人以眇眇之身,兴兵诛暴乱,赖宗庙之灵,六王咸伏其辜,天下大定。今名号不更,无以称成功,传后世。其议帝号。”

召集博士会同百官廷议后,丞相王绾、御史大夫冯劫、廷尉李斯等人上书回答说:“今陛下兴义兵,诛残贼,平定天下,海内为郡县,法令由一统,自自古以来未尝有,五帝所不及。”他们建议采用古来的“泰皇”称号。天皇、地皇、泰皇,是古来三位神王的称号:天皇,是统治天上世界的神王;地皇,是统治地上世界的神王;泰皇,是统治人间世界的神王。秦王政回复说:去掉泰皇的“泰”,保留“皇”字,采用帝号的“帝”,定新的称号为“皇帝”。皇帝的称号,由此诞生。

由皇帝称号的制定可以看出,在秦王朝的观念中,皇帝的皇,超越天皇、地皇和泰皇,是统治天上、地下和人间的绝对神王,皇帝的帝,超越古来圣王的五帝,是从未有过的圣王。这不但古来从未有过,将来也不会再有。从而,秦王政在诏令中否定了传统,宣布废除君王死后制定谥号的做法,进而宣称“朕为‘始皇帝’”,后世以计数,二世三世至于万世,传之无穷”。

李开元指出,邹衍的五德终始说,是一种在德运主导下的王朝循环论的历史观。秦王朝的这种历史观,可以称之为历史终焉观,认为从此进入一个没有循环的永恒时期,超越三皇五帝的皇帝,王朝将代代传承下去。这种盲目自信自大,也是加速灭亡的重要因素。

秦帝国速亡的历史教训,几乎成为永恒的话题。两千年来,无论古今中外,无数的历史学家、政论家、文人学士,曾经加入讨论。其中最常见的意见是:秦朝的制度严苛,施政暴虐,统一天下后,对外南北用兵,国内大兴土木,滥用民力、物力,造成了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;加上继承人选用不当,胡亥昏聩残暴,引发紧张关系的总爆发,导致二世而亡。而《刺秦》一书从秦王朝宇宙观的角度进行分析,角度独特,引人深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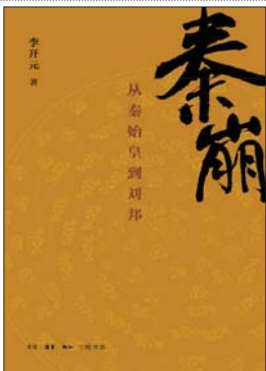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刺秦:重新认识秦王朝》
李开元 著
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《秦谜:重新发现秦始皇》
(插图增订版)
李开元 著
活字文化 |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《秦崩:从秦始皇到刘邦》
李开元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